

两汉文学

卞孝萱 王琳 著

中国古代文学知识丛书

安徽教育出版社

LIANGHAN WENXUE

两 汉 文 学

卞孝萱 王 琳 著



Zhongguo Gudai Wenxue Zhishi Congsh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汉文学/卞孝萱,王琳编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7

(中国古代文学知识丛书)

ISBN 7-5336-2747-4

I. 两... II. ①卞...②王... III. 文学史—中国—
两汉时代 IV. I20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6307 号

责任编辑:张丹飞 装帧设计:周建荣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安徽天歌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75

字 数:250 000

版 次: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15.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目 录

导 论	1
-----	---

第一编 两汉辞赋

第一章 西汉初期辞赋	20
第一节 贾谊赋	21
第二节 枚乘等藩国文人赋	25
第二章 西汉中期辞赋	32
第一节 司马相如赋	34
第二节 东方朔、王褒等赋家	41
第三章 西汉后期辞赋	53
第一节 扬雄赋	53
第二节 刘向、刘歆父子及其他赋家	64
第四章 东汉前期辞赋	70
第一节 班彪、冯衍等东汉初期赋家	72
第二节 班固与明、章时期赋家	78
第五章 东汉中后期辞赋	89
第一节 张衡与东汉中期赋家	92
第二节 蔡邕与东汉后期赋家	103

第二编 两汉诗歌

第一章 汉代乐府民歌·····	115
第一节 乐府的扩充与民歌的采集·····	115
第二节 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	120
第三节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	132
第四节 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与《孔雀东南飞》·····	139
第二章 汉代文人诗歌·····	147
第一节 东汉文人五言诗·····	148
第二节 两汉文人的楚歌、四言诗及七言诗 ·····	164

第三编 两汉散文

第一章 西汉初期散文·····	184
第一节 贾谊等中央朝士之文(附刘恒)·····	185
第二节 刘安等藩国君臣之文·····	206
第二章 司马迁与《史记》·····	223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的思想内容·····	223
第二节 《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成就及影响·····	236
第三章 西汉中后期散文·····	254
第一节 司马相如等武帝朝作家之文·····	256
第二节 桓宽等宣帝及元帝初作家之文·····	271
第三节 刘向等成、哀时期作家之文 ·····	285
第四章 东汉散文·····	303
第一节 建武年间之文·····	307

第二节	王充《论衡》与班固《汉书》及其他·····	319
第三节	东汉后期之文(上)·····	338
第四节	东汉后期之文(下)·····	352

导 论

由刘邦创建、定都长安的西汉(或称前汉)王朝,与由刘秀创建、定都洛阳的东汉(或称后汉)王朝,在长达四百载的绵延中,除经历两汉之际及东汉末期诸如王莽篡权、农民起义、军阀混战等约合半个多世纪的严重动荡外,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基本得以持续。特别是西汉武、宣等时期,汉王朝以强盛雄张的国力,声威远播,其疆域北起河套、阴山山脉,东临大海,东北至朝鲜半岛北部,南达两广、越南北部中部,西南至云贵高原,西北拓及巴尔喀什湖东南、锡尔河上游和帕米尔高原,幅员之辽阔,堪称空前。在此基础上,统治者大力推行教化,从京城到地方,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教育体系日益发达。至东汉前期,中华文明得到广泛传播。所以,班固《两都赋》有“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描述。王充《论衡》之《宣汉篇》则侧重颂扬中华文明的广泛传播:“四海混一,天下定宁……迴路无绝道之忧,深幽无屯聚之奸。……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跼,今履高舄。以盘石为沃田,以桀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又同书《恢国篇》云:“巴、蜀、越雋、郁林、日南、辽东、乐浪,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咏《诗》、《书》。”字里行间虽不免夸张渲染,但联系王充“疾虚妄”的创作宗旨,参证《汉书》、《后汉书》的有关记载,应该说他

的议论大体上概括了统一的汉帝国社会文化趋于显著进步的历史真实。汉帝国的强盛及中华文明的广被,不仅激发了文人学士强烈的进取精神,也拓展了他们的胸襟与视野,司马相如等以“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家之心和“极声貌以穷文”的艺术追求制作的宏丽之赋,司马迁矢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结撰体大思精的《太史公书》,以及班固《汉书》等皇皇巨著产生于两汉盛世,绝非偶然。

文化的影响交流是双向的,在华夏文明传播推广的同时,汉人对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外来事物持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态度,异域之人员物品及文化艺术逐渐传入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华夏大地。汉王朝设置有掌管与各国各族交往事务的专职官员,西京长安建有专门接待各国各族人员的馆舍,京畿上林苑的许多珍奇动植物来自异域;东汉建都洛阳,各方人物云集,商贸及文化交流亦很频繁,辛延年所作著名歌辞《羽林郎》中的主角便是由西域到洛阳经营酒店的胡姬,应劭《风俗通义》及《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洛阳贵戚皆竞为之。终汉之世,西域的音乐舞蹈、罗马的杂技、天竺的佛教等陆续流传中原。其中西域的音乐舞蹈对汉代文学艺术的不断丰富与发展的影响尤为显著。以诗歌为例,《乐府诗集·鼓吹曲辞》所录西汉《铙歌十八曲》就是配合当时传入的北狄西域之乐演唱的歌曲。由于西北少数民族音乐之独特的曲调节奏的制约,《铙歌》十八曲歌辞全部呈现参差错落的杂言句式,从而开创了我国杂言体诗歌的新纪元,正如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所说:“吾国诗歌之有杂言,当断自《铙歌》开始,以十八曲者无一而非长短句,其格调实为前此诗歌之所未有也。《诗经》中虽间有其体,然以较《铙歌》之变化无常,不可方

物,乃如小巫见大巫焉。此当由于《铙歌》为北狄西域之新声,故与当时楚声之《安世》、《郊祀》二歌全然异其面目。而音乐对于诗歌之影响,亦即此可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52~53页)。

作为大一统的帝国,汉王朝在思想领域已不能重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但相对于秦王朝焚《诗》、《书》百家语,以吏为师,专任刑罚的严峻的法家政治文化模式,汉王朝的思想文化环境还算宽松,尽管它在各个具体阶段的表现并不平衡。这是两汉文学之繁荣所凭依的基本条件。

西汉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矫秦弊政,稳定社会,恢复生产,于是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家黄老之术与提倡仁政王道、制民之产、轻徭薄赋的儒家之学应运成为统治者及士人行政议政所遵循的思想基础;此外,申商刑名、纵横、阴阳、兵等学派的思想也未沉寂,且诸家思想流露出相互交融综合的走向。统治者改秦之败政,废除挟书律及诽谤、妖言之法,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并采取举贤良对策、下诏求言等方式,鼓励士人畅所欲言,指陈朝政阙失,在此宽松的时代气氛中,陆贾、贾山、贾谊、晁错、刘安等一批继承战国诸子传统的政论作家相继出现,揭开了两汉政论文辉煌的序幕。受文景之治的沾溉,武帝即位国力臻于大盛,藩王势力日益衰微,出于统一思想以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的政治需要,刘彻采纳以研治春秋公羊学著称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致使儒学从众多学派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但西汉中期独尊儒术的实质性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兴太学,置明师,推广教化,扩大儒家思想的影响,将解读经书与仕宦利禄相连结,选官择吏广取儒生,以致人们踊跃崇儒读经,趋之若鹜,形成“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儒学)之士”(《汉书·儒林传》)的局

面。统治者对于儒家以外的各家学说,尚能兼容并包,并未采取强制性的罢黜行动,更没有像秦始皇那样焚书或因藏书而杀人,因此不仅先前的诸子书得以整理保存流传,而且当时仍有撰写子论的士人。《汉书·艺文志》载,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书写之官,儒家经书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该志著录西汉中期子论,道家类有婴齐十二篇,纵横家类有主父偃十八篇,杂家类有东方朔二十篇。实际上董氏倡导的儒学是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糅合了阴阳五行、黄老刑名等各家观点的新儒学,具有明显的兼融性。武帝及其继承者昭帝、宣帝在行政中兼融综合各家思想的倾向也很明显,宣帝曾公开宣称:“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之前,昭帝时召开盐铁会议,合观论辩双方的议论,可称得上“霸王道杂之”的系统讲解,而除儒法思想有突出的展示外,道家思想也时有流露。西汉后期元成诸帝偏重儒术,儒生势力空前膨胀,经学昌盛。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概括其情况说:“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依据。”但此数帝对儒家经典以外的图书并未罢黜,而是予以收集整理保护。《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成帝时遣人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等“校经传诸子诗赋”及“兵书”、“数术”、“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刘向卒,汉哀帝复使其子刘歆继成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汉书·艺文志》即依《七略》而作。尤其是道家观念成为某些士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学者及文学家扬雄便是儒道兼融的一个典型人物。东汉前期诸帝亦偏好儒术,刘秀即位,访求儒雅,四方儒士抱负坟策,云会京师;明帝亲临太学讲经,冠带缙绅观听者不计其数;章帝少宽容,好儒术,即位后召诸儒在白虎观议五经同异,亲称制临决,连月而罢。由今文经学派生、兴于西汉末

的谶纬神学至此颇受统治者的青睐,其用人行政亦往往以谶决之;自西汉来以私学身份流传的古文经学此时呈现迅猛的上升势头,堪与列于学官的今文经学相抗衡。种种迹象表明,光武、明、章三代是经学的极盛时期。桓谭、王充等思想家却未被尊经风气及谶纬神学观念所囿,特别是王充,吸收了天道自然无为等黄老道家思想营养,对今文经天人感应说及其派生的谶纬神学的虚妄,俗儒解经的穿凿附会,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对儒家经书的权威性提出质疑,以为诸子书未必不如经书,不能以经书的是非为是非;还对汉儒神化孔子、崇拜偶像的行为予以指责。其他如冯衍等著名文人在创作中则时而流露对儒家以外的其他学派尤其是道家思想的认同。伴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尤其是朝廷中枢宦官外戚专权以及地方上豪族地主势力的增长,皇权的日蹙,儒家大一统思想与现实政治局势的矛盾愈益突出,东汉中后期儒学逐渐从先前的显赫地位衰落下来,其他学派的思想则明显地趋于活跃,尤其是道家老庄之学受到士人的普遍认同,张衡、崔瑗、王符、蔡邕等著名士人也不例外。甚至名闻遐迩的儒学大师马融,其治学及为人也浸染了浓重的道家成分,史载他除注五经外,还注《老子》、《淮南子》、《离骚》,为人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倡言生贵于天下;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广大士人由对朝廷的信任危机,进而产生对儒家经学的信仰危机,其时虽不乏“驱驰险阨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取义殉道的人物,但许多士人对儒家经学的济世化俗功用已不抱希望,异端思想纷起。或呐喊“叛散五经,灭弃风雅”,或主张“遭时定制,参以霸政”,或希企隐逸自适,乃至把优游山水的愉悦提到“岂羨夫帝王之门哉”的位置,或宣扬及时行乐,秉烛夜游,或冲破传统的君臣之义,游说权威人物推翻刘氏皇帝,建

立新朝,思想言论之活跃大胆为有汉以来所罕见,正如曹丕《典论》云“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就连最高统治者汉桓帝,也试图转向道家黄老寻求精神支柱,曾祀黄帝、老子于洛阳濯龙宫,并数次遣吏往苦县祀老子。自汉武帝以来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受到巨大的冲击,可谓“纲纪既衰,儒道尤甚”(《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东汉的中后期文学的丰富多彩及此社会背景与思想文化环境戚戚相关。

在较为宽松的思想文化气氛中,汉代统治者中出现了不少爱好并提倡文学的人物,其中有武帝、宣帝、元帝、成帝、光武帝、明帝、章帝、灵帝等君主,也有梁王列武、淮南王刘安、东平宪王刘苍、琅琊孝王刘京及北海靖王刘睦等藩王。这批人中,汉武帝对汉代文学之昌盛所起的作用尤大,他酷爱辞赋、音乐,以枚乘善赋,即遣人用安车蒲轮召之;读司马相如赋,大为赞叹,遂即召之;每宴见淮南王刘安,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暮然后罢;朱买臣能说《春秋》、楚辞,甚悦之,拜为中大夫。在他的倡导下,言语侍从之臣及公卿大夫踊跃写作辞赋,形成我国文学史上文人创作纯文学体裁的第一个高潮;他扩充乐府机构,喜欢俗乐,广泛采集民间歌谣,配乐演唱,使其成为我国诗苑璀璨夺目的奇葩。宣帝也颇好辞赋歌诗,“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才刘向、张子乔、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又“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元帝为太子时,喜爱王褒所作《甘泉》及《洞箫赋》,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之。(见《汉书·王褒传》)“成帝性宽而好文辞”(《汉书·谷永杜邳传》)。其他诸帝、诸王在好尚文辞方面有不同的表现,而尤以汉灵帝思想解放,提倡有力,而影响巨大。灵帝嗜好文学艺术,善鼓琴、吹洞箫,撰《皇羲篇》五十篇,执

政时多选用在文学艺术上有所擅长者为官,改变以前偏重经学之士的风气,形成书画辞赋备受青睐,乃至“诸生竞利,作者鼎沸”的盛况;并于光和元年(178)创建鸿都门学(因校址设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课试,至千人焉”(《后汉书·灵帝纪》注)。又据《后汉书》之《蔡邕传》、《杨赐传》及《阳球传》记载,鸿都门学士以造作赋说、虫篆小技,见宠于时,旬月之间,各受丰爵不次之位,甚至诏敕中尚方为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像立赞,以劝学者。以如此速度力度提高文学艺术人才的地位,是前所未见的,它直接为建安时期“主爱雕虫,家弃章句”的尚文局面掀开了序幕,亦开后世文艺专科学校之先声。总之,统治者的爱好与提倡,促进了汉代文学的繁荣。

与前代相比,两汉时期以撰作文章著称的人物逐渐增多,时人往往把善于撰作文章作为概括人物素质、才能的一个标准,史书也开始为文学家立传,且对撰作各体文章与研治儒家经学在性质上已有明显的辨析区别。第一个为文学家立传的是司马迁,其《史记》有《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东汉班固则把研治儒学与撰作文章(广义性概念,包括诗赋等纯文学样式,也含奏议等应用文及史书、子书等)明确区分开来,如《汉书·公孙弘传赞》:“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文章则司马迁、司马相如”,“萧望之、夏侯胜等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班氏为不少以文章著称的人物立传,如《汉书》卷三十三《刘向传》,卷四十三《陆贾传》,卷四十八《贾谊传》,卷五十一《贾(山)邹(阳)枚(乘)路(温舒)传》,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卷六十四《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王(褒)贾(捐之)传》,卷六十五《东方朔传》,卷八十七《扬雄

传》，同时大量地收录其作品入传；其中的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王褒、刘向及枚乘之子枚皋，班固在《两都赋序》直称之为以长于言谈文辞活跃于宫廷的“言语侍从之臣”。在其他志、传，也不时可见对某个人物能文之才能素质的评价，如《地理志》述蜀中文才之盛，称司马相如“以文辞显于世”，“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开后世作家合赞此四人的先声，如鲍照有《蜀四贤咏》），《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称刘安“辩博善为文章”，《陈汤传》称陈汤少好书，“博达善属文”，等等。历经东汉几代史家而撰成的《东观汉记》，也有类似记载，如《班固传》称班固“能属文诵诗赋”，《田邑传》称田邑“有大节，涉学艺，善属文。”应该说，这种情况对范曄《后汉书》及以后史书设置《文苑传》、《文学传》是有所启发影响的，姚思廉《梁书·文学传论》指出：“昔司马迁、班固书，并为《司马相如传》，相如不预汉廷大事，盖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为《贾（山）邹（阳）枚（乘）路（温舒）传》，亦取其能文传焉。范氏《后汉书》有《文苑传》，所载之人，其详已甚。”两汉相较，东汉以文章著称的士人进一步增多，故《后汉书》除依仿《史记》、《汉书》之例，为桓谭、冯衍、班彪、班固、王充、张衡、马融、王符、崔骃、崔瑗、延笃、蔡邕等著名文人立传外，还以类相从，专设《文苑传》，为杜笃、傅毅、李尤、苏顺、王逸、王延寿、崔琦、张升、赵壹、酈炎、侯瑾、祢衡等二十多位文人立传，动辄以“能文章”、“善属文”、“有文才”、“以文章显”称之，这说明东汉时期比较专门化的文人阵营已经相当可观，且撰作辞章的风气愈益浓重。《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代别集（经后人之手编定），计有西汉二十八种，东汉五十二种，亦可证东汉文人及创作更趋兴盛。东汉文集，又以中后期尤其是后期为多，这显系经学衰而文章盛之时代风气的折射。中唐古文巨子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

说“汉朝人莫不能文”，此话虽不无夸张，但的确揭示了汉代文人趋多、文风颇盛的事实。

文体形式在汉代亦逐渐趋于多样纷盛，自西汉初迄东汉末，产生许多新的文体形式，奠定后世常用文体的基础，故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后汉书》著录的文体，有诗、赋、铭、诔、颂、书、论、奏、议、记、碑、箴、七、九、赞、连珠、吊、章表、说、嘲、策、教、哀辞、檄、难、答、辩、祝文、荐、笈等三十余种；任昉《文章缘起》（又名《文章始》）一书收文体 85 种，各列举一篇早期作品以追溯每体起源，其中有近 70 种始于汉代，任书分类虽失于琐碎，但并不妨碍我们用以说明两汉文体的多样纷盛。

文人创作是两汉文学的主流，民间创作也取得很大的成就，从总体上来看，两汉文人及民间创作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辞赋、史传、政论、诗歌等品类方面。辞赋是汉代最兴盛最有代表性的文体，从西汉初贾谊，中经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到东汉末赵壹、蔡邕，漫漫四百年间的著名文人无不染指于此，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佳篇迭出，蔚为壮观，彪炳千古。史传的成就在汉代达到顶峰，标志性的著作是司马迁所撰、被鲁迅先生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班固《汉书》的文学性逊于《史记》，但部分篇章叙事写人别具特色，明显优于后世同类史传，故历来文人学士往往将《史》、《汉》并称；此外，《吴越春秋》之类不拘于正史写法的杂史，开后世历史演义小说的先声，为汉代史传大家族增添了异彩。政论（包括单篇文章和大部头著述）是汉代相当普及的一大文类，一代又一代文人在这块园地上施展才华，或为单篇，或成专书，络绎不绝地涌现内容充实、思想深刻、感情充沛、文采可观的珍品名著。汉代诗歌的瑰宝是乐府民歌和以

“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诗,汉乐府民歌以其浓重的叙事性、成功的叙事手法,质朴自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以及灵活多样、富于创造性的诗歌形式而卓立诗苑;“古诗十九首”以其高超的抒情艺术,标志着我国早期文人五言抒情诗的成熟。

汉代人的文学观念基本呈现尚丽与尚用并存的状态。一方面,时人已比较普遍地注意到辞赋这一纯文学体裁与其他著述的不同的特点,往往以“丽”字概括辞赋的特点,且持肯定或推崇的态度。如汉宣帝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扬雄倾慕司马相如赋的“弘丽”,桓谭称扬雄赋为“丽文”,王充称班固、杨终、傅毅“赋像屈、贾”,“文辞斐炳”,班固肯定屈原《离骚》“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崔瑗称张衡赋“瑰辞丽说”、“磊落焕炳”,等等。这种观念表现在图书分类上,就是把辞赋与六艺、诸子等加以区分而独立出来,其实践者是西汉末著名文人刘向。刘向既推崇屈原高尚的志节,亦认同其“垂文扬采”的创作艺术,他的《别录》把图书分为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几类,使诗赋在图书分类中具有了独立的地位。刘歆《七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继承了这种分类。汉代人对辞赋之“丽”的特点的认识及以屈原为辞赋宗的观念,影响相当深远,而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家的影响尤为直接显著,如曹丕《典论·论文》辨析各种文体的特点,有云:“诗赋欲丽”;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勾勒周汉文学演进,有云:“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其观念与汉人一脉相承。

另一方面,汉代人又往往基于儒家的政治功利观念,以政论等实用文章为标准来规范辞赋,强调依经立义,注重政教风化、美刺劝戒的作用。如司马迁在指出司马相如赋“靡丽多夸”之特

点的同时,笔锋一转,称相如赋“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见《史记》之《太史公自序》、《司马相如列传赞》)此后,扬雄说司马相如赋“文丽用寡”(《法言·吾子》);汉明帝说司马相如赋为“浮华之辞”,“不周于用”(班固《典引》引);王充说司马相如、扬雄赋“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论衡·定贤篇》);班固说枚、马、扬赋“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风谏之义”(《汉书·艺文志》),其《两都赋序》则以为武帝、宣帝时期赋家“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诸家之说,或肯定,或否定,态度有异,但立论的基础或标准相同,显然一派美刺劝戒、政教实用的腔调。

总之,汉代人是在伴随着辞赋的盛行而产生较自觉的尚丽意识的同时,又蒙受着浓重的儒家宗经尚用观念的束缚。摆脱儒家经学的束缚,冲决政教功利的罗网,对辞赋的艺术特质予以旗帜鲜明的肯定、倾慕与追求,是思想获得较大解放的魏晋文人的历史使命。

对别的文体,汉代人更加强调其政教实用的价值和作用。如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汉书·贾谊传》引)后来诸家之说,尤以王充直截了当、简明扼要。其《论衡·对作篇》云:“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案书篇》称陆贾、董仲舒之书“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佚文篇》:“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自纪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可以说,从西汉之陆贾、贾谊、晁错、刘安、董仲舒、刘向等,到东汉之桓谭、王充、王符、崔寔、仲长统等,写作政论之文均遵循着这